

人口结构转型下的县域学前教育生态变迁：基于瑞安市的实证研究报告

颜睿泓

华润小径湾贝赛思国际学校，广东 惠州 516083

DOI:10.61369/EIR.2025080016

摘要： 随着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的深度转型期，人口流出型地区的基础教育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冲击。本研究以浙江省瑞安市为典型案例，旨在系统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县域学前教育供需关系的具体影响机制。通过综合运用历年人口普查宏观数据与针对六所不同类型幼儿园管理者的深度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研究揭示了瑞安市人口结构呈现显著的“底部收缩”与“顶部扩张”特征：0-4岁学龄前人口的断崖式减少已在微观教育层面引发了剧烈的连锁反应：幼儿园生源枯竭导致财务赤字，进而引发师资流失与办学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在塘下、鲍田、场桥等乡镇及农村地区，这一危机呈现出更强的脆弱性与不可逆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从单纯的“规模扩张”逻辑转向“存量优化”逻辑，通过建立财政托底机制、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以及引入多元社会力量，以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教育治理挑战。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型；学前教育；生态变迁

Ecological Changes in County-level Preschool Education under Popula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Ruian City

Yan Ruihong

BASIS International School Huizhou, Huizhou, Guangdong 516083

Abstract: As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enters a deep transformation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coexistence of low birth rate and aging",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in population-outflow area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structural shocks. This study takes Ruian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pecific impact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changes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of county-level preschool education.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macro data from previous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managers of six different types of kindergarten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Ruian City show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bottom contraction" and "top expansion": The sharp decline in the population of children aged 0-4 years old has triggered a severe chain reaction at the micro educational level: The depletion of kindergarten students has led to financial deficits, which in turn has triggered the loss of teachers and a decline in educational quality in a vicious cycle. Especially in towns and rural areas such as Tangxia, Baotian, and Chengqiao, this crisis shows greater vulnerability and irreversi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shift from the simple "scale expansion" logic to the "stock optimization" logic, and through establishing a fiscal guarantee mechanism, building a rural-urban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introducing diverse social forces, to address the education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the era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Keywords: popula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cological change

引言

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少子化”与“负增长”的历史性转折期^[1]。这一宏观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剧烈的异质性：不同于一线城市凭借虹吸效应维持的人口年轻化，三线城市及广大县域，正遭受“自然增长率下降”与“机械增长率负值”的双重挤压^[2,3]。学前教育作为对人口变动最敏感的学制起点，正面临需求侧的断崖式下跌。人口学意义上的“少子化”在教育经济学层面迅速转化为“规模不经济”——生源萎缩导致班级规模缩减，推高生均固定成本，使缺乏财政全额兜底的乡村幼儿园陷入财务困境^[4,5]。现有文献指出，

当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时，区域社会将面临“低生育率陷阱”风险，进而触发乡村教育的“空心化”螺旋^[6-8]。如 Hannum 等人（2022）所述，农村学校的收缩往往伴随着“规模萎缩—资源撤出—人口进一步外流”的负向循环^[9]。

本研究旨在通过以瑞安市为代表的实证分析，厘清宏观人口减少如何具体传导至微观的幼儿园运营（招生、财政、师资），并解析城乡教育在应对冲击时的差异化表现。通过剖析瑞安的案例，本文试图回答：在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政府与社会应如何重构教育资源配置逻辑，以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托底”的战略转型。

一、实验与方法

为了全方位捕捉人口变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范式（Mixed-Methods Research），旨在实现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的互证。

在宏观层面，研究主要依托瑞安市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及统计年鉴，重点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通过构建人口金字塔模型，对比0-4岁（学前适龄）与5-9岁（小学低段）人口队列的代际变化，并引入深圳市作为“人口净流入”的参照组，以凸显瑞安市作为流出型地区在老龄化与少子化方面的严峻程度。

为弥补宏观数据的解释局限，研究采用了目的性抽样法（Purposive Sampling），选取了瑞安市涵盖乡镇与街道、民办与集体办学性质的6所典型幼儿园（如塘下堡德莱、鲍田第一幼儿园等）进行深度调研。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核心聚焦于招生数量变化、班级规模调整、经费收支平衡及师资稳定性四个维度，从而揭示宏观人口数据是如何具体转化为基层学校的运营压力与生存危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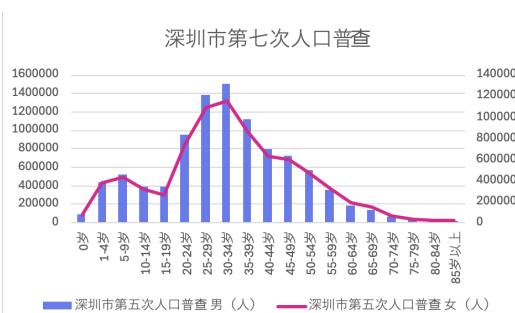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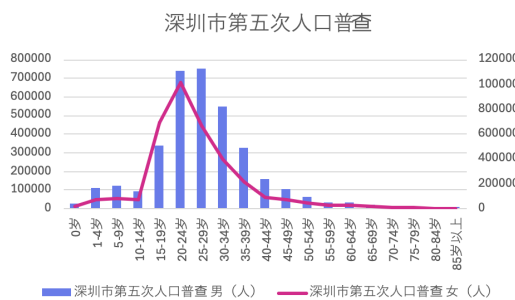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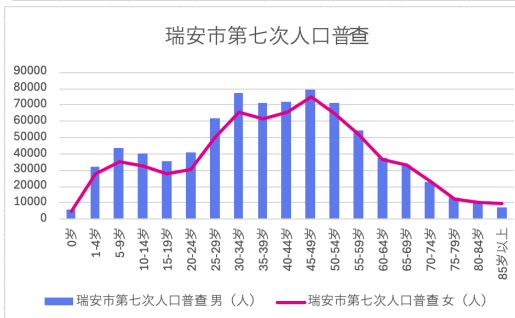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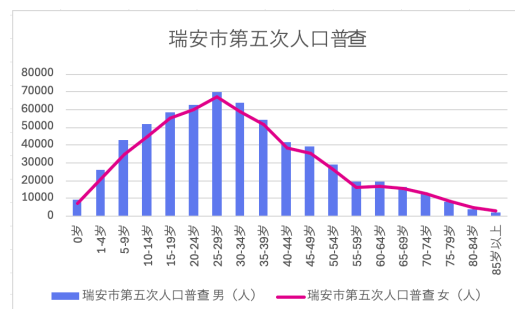
二、数据分析

在图1中我们给出了瑞安市的人口普查的变化数据。通过对瑞安市人口数据的纵向梳理，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人口主力军的代际转移。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25-29岁的青壮年群体构成了人口金字塔的最宽处，显示出当时瑞安市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与较强的生育潜力。然而，最新的数据表明，这一主力人群已上移至45-49岁区间。

这一变化揭示了两个关键事实：劳动力老化：年轻劳动力的比例显著下降，意味着能够支撑城市经济扩张与税收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这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能力。生育基数萎缩：随着育龄妇女规模的缩减，即便生育政策放开，受制于育龄人口基数的下降，出生人口总量也难以回升。这种结构性的萎缩比周期性的波动更为致命。

最令人担忧的趋势在于人口金字塔“塔基”的剧烈收缩。图表数据显示，瑞安市0-4岁与5-9岁低龄段的柱状图长度相对于中上部（青壮年及老年）明显缩短。这种典型的“底部收缩”形态，直接对应着近年出生人口的绝对减少。0-4岁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未来3-5年内，幼儿园的入园需求将持续处于低位。这不仅是短期波动，而是基于人口存量的长期趋势。根据人口学规律，这一低谷将至少持续一个代际周期。5-9岁人口的不同步减少，预示了小学及初中阶段在未来数年内也将面临生源缩减的压力。

生源危机将沿着学制阶梯逐级向上传导，未来的初中和高中也将面临同样的“生源荒”。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瑞安市的人口困境，我们将其与深圳市的人口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图2中可以看出，深圳市虽然人口总量庞大，但其各年龄段分布相对均衡，且主要由年轻外来人口构成，尚未出现瑞安市那种明显的“人口滞留导致的老龄化”现象。

在我们的访谈中，数据揭示了生源减少的“断崖式”特征。

塘下堡德莱幼儿园园长在访谈中透露了极具冲击力的数据：“近3年我们幼儿园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出生率的下降，更暗示了该区域年轻家庭的大量外迁。更具体的结构性失衡体现在“出入剪刀差”上：2023年秋季，该园大班毕业了4个班级，释放了数百个学位，但新入园的小班仅招收到9名学生。9名学生甚至无法组成一个标准的教学班（通常小班标准为20-25人）。这意味着该年级段的班级建制直接从4个缩减为0.5个（混龄或小班额教学）。这种高达75%-80%的班级缩减率，对于任何教育机构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生源危机并非个案，而是行业性困境。几乎所有受访园长均证实，“每年秋季招生比往年少1个班”已成为常态化现象。场桥五林幼儿园与鲍田第一幼儿园的反馈进一步指出，入园率的低迷主要集中在3岁的小班段。小班是幼儿园生源的“入口”，小班生源的枯竭意味着未来三年内，中班、大班的生源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连锁式下滑。

学前教育行业具有显著的“高固定成本”特征。房租、水电、基础设施维护以及保教人员的基本工资属于刚性支出，不随学生人数的减少而同比例下降。然而，收入端（学费、保教费）却与学生人数呈严格的线性正相关。一位园长直言：“先做到优质办学不可能”。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当前的生存悖论。在资金链紧张的生存红线下，教育质量的提升已被迫让位于基本的运营维持。

假设一个班级的配班教师工资和教室分摊成本为每年20万元。如果班级有25名学生，生均成本为8000元；如果只有9名学生（如塘下堡德莱幼儿园案例），生均成本激增至2.2万元以上。如果学费无法同比例上涨（受限于物价局规定和家长支付能力），每一名新招的学生实际上可能都在“亏损”。

财政压力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教师队伍。访谈显示，生源减少导致教师面临双重困境，进而影响了整个区域的师资稳定性。许多民办及乡镇幼儿园的教师工资结构包含“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往往与班级人数或全园盈亏挂钩。生源减少直接拉低了教师的实得收入。班级合并或撤销意味着不再需要同等数量的配班教师。例如，如果全园减少了3个班级，理论上就多出了6-9名冗余教师。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教师队伍的极度不稳定。资深教师倾向于跳槽至更有保障的公办园或转行，年轻教师则将乡镇幼儿园视为临时跳板。访谈中，园长们普遍反映“留不住人”。

三、讨论

本研究表明，人口负增长已不再是瑞安市教育系统的远期挑

战，而是正在发生的系统性危机。

瑞安市学前教育的困境本质上是商业模式与人口趋势的错配。传统的办学逻辑建立在“生源充足”和“规模效益”基础之上，一旦人口红利消退，就会有教育行业崩塌的危险。

进一步地，人口退潮并非均质分布，而是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分裂。城区优质园凭借资源优势，在总量减少的背景下，反而能通过吸纳周边乡镇生源维持生存，形成“强者愈强”的资源集聚。乡镇幼儿园处于人口流出的末梢，承受着“出生率下降”与“机械外流”的双重打击。一旦幼儿园关停，年轻家庭将彻底因教育问题离开乡村，加速乡村的衰败。

面对不可逆转的人口趋势，试图通过“刺激生育”短期回补生源已不现实。教育治理必须摒弃扩张期的思维，转向收缩期的“存量优化”与“底线思维”。

单一的“生均公用经费”模式在生源萎缩期会加速小规模学校的死亡。政府可以建立“基础运营补贴”机制，即只要学校承担了必要的片区公共服务职能，无论生源多少，财政应兜底其房租、安保等固定成本，确保乡村教育网点不因市场失灵而崩塌。

应对“空心化”的唯一解是资源共享。政府可以推行紧密型城乡教育共同体，实行法人融合、师资统筹。通过将乡镇“弱园”变为城区“名园”的分支机构，利用数字化手段拉平教学质量，从而遏制生源的非理性外流。

在财政紧缩背景下，幼儿园应转型为“社区儿童中心”，通过提供0-3岁托育、家庭教育指导等延伸服务，增加收入来源并增强用户粘性。同时，引导本地企业与公益组织定向资助乡镇教育设施，形成政府兜底、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生态。

四、结论

瑞安市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化转型，不仅是中国广阔县域与乡村地区在后人口红利时代遭遇“生源断崖”的典型缩影，更揭示了教育生态系统在面对“规模不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本研究证实，0-4岁人口的减少已触发了“生源萎缩—财政赤字—质量降级—加速外流”的系统性负反馈循环，如果不加以干预，这将导致乡村教育网点的崩溃与城乡差距的固化。

展望未来，面对不可逆转的收缩常态，教育治理逻辑必须完成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与“韧性建设”的根本性跨越。通过建立突破生均限制的财政托底机制、实施实质性的城乡教育共同体融合、并探索托幼一体的多元化服务模式，构建一个适应少子化社会、具有高度适应性与普惠性的教育新生态。

参考文献

- [1] 王晓峰与全龙杰，少子化与经济增长：日本难题与中国镜鉴[J]. 当代经济研究，2020. 297(5): 第85-92页.
- [2]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3. 1(5): 第125-136页.
- [3] 于涛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12. 4: 第47-58页.
- [4] 王德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现状、问题和出路[J]. 中国农村经济，2003. (11): 4-11.
- [5] 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 人口研究，2008. 32(2): 第45页.
- [6] 叶华与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J]. 社会学研究，2011. 5: 第153-177页.
- [7] 蔡泳，再论中国生育水平：教育统计真的是估计生育水平的黄金标准吗？——对使用教育统计数据估计生育水平的探讨[J]. 人口研究，2009(4): 第22-33页.
- [8] 夏乐平，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J]. 人口研究，2005. 29(4): 第2页.
- [9] Hannum, E., J. Kim and F. Wang, From Population Growth to Demographic Scarcity: Emerging Challenges to Global Primary Education Provis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enberg Institute for School Reform at Brown University, 2025(EdWorkingPaper No. 25-1185).